



引导全球增强而非削弱合作

作者：Vitor Gaspar、Sean Hagan 和 Maurice Obstfeld

2018年9月6日



由于全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联系，因此通过齐心协力，各国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图片：Anton Sokolov/iStock by Getty Im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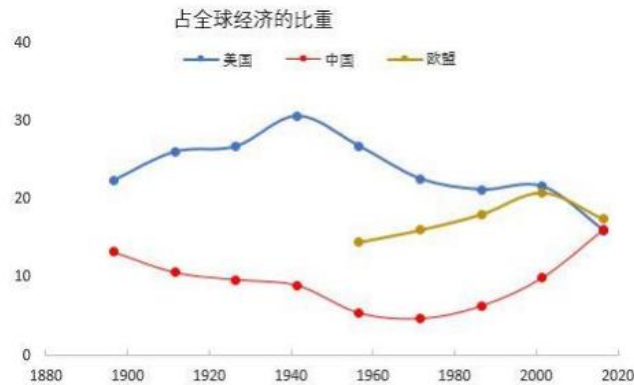
如果各国认为合作符合其最大利益，包括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那么，它们就会开展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通过规则、共同原则和制度构成的体系开展全球合作。这种合作带来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使数百万人摆脱极度贫困状况。十年前，各国携手合作，协调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确保“大衰退”没有成为另一次“大萧条”。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举行了第一次峰会，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大型新兴市场汇聚一起，会议象征着紧迫的合作精神。显然，各国通过齐心协力，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然而，当世界经济日趋复杂、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时，世界各国采取集体行动的意愿却在减退。全球合作体系目前正承受着压力。

全球经济融合

发达经济体从支持国际贸易等全球公共产品中获得的
好处正越来越多地与其他国家分享。

(百分比)



来源：基金组织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Maddison Project 数据库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图中的每个数据点表示全球经济中每个国家/国家组15年的世界GDP年均权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1年美元）。



人们质疑当今国际合作能否继续带来好处，这有可以理解的原因。各国内部的经济不平等在扩大，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许多家庭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甚微，许多社区遭受着失去工作和整个行业的痛苦。因此，当政治家声称全球合作不利于解决本国问题时，选民更容易接受这种说法。

但退出国际合作却是一个错误，这会导致引发危机的某些条件重现。然而，除非获得国内政治支持，否则各国不会采取合作性政策。因此，只有当政府向选民表明国际合作能带来切实好处，各国才不会失利。

国际合作面临压力

有两个主要因素削弱了人们对经济合作带来好处的信心。

首先，技术创新和不断扩大的全球贸易虽然极大地降低了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但同时也是许多发达经济体内部不平等加剧的部分原因。在公众眼中，贸易看来是罪魁祸首，因此，人们对通过加强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扩大贸易提出质疑。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合作取得成功，然而正是这种成功使得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所占世界经济活动的比例不断下降，而新兴市场所占比例上升。

该图显示了1950年以来的这一显著变化。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从支持国际贸易等全球公共产品中获得的益处正在越来越多地与其他国家分享。

这一变化也许有助于解释以下现象：美国领导的全球化和国际合作在促进贸易和提高世界各国的人均收入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却削弱了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内公众对合作的支持。在当今多极世界中，合作更加难以维持。

对全球合作的持久需求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各国仍需要加强而非削弱多边主义。为什么？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

首先，信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增强了互联性和复杂性。各种想法在到处传播。全球供应链使生产变得日益国际化，因为各国自身的出口越来越依赖国外投入。

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很多，其中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下降，流行病和超级病菌风险，清洁水稀缺，海洋退化，网络犯罪，恐怖主义，大规模移民，以及逃避纳税。

各国无法单独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开展合作。

某些具有社会破坏性的贸易形式，如贩卖人口、毒品和武器，以及非法资金的匿名跨境流动，也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同样，各国当局迫切需要找到解决办法。集体行动至关重要。

建立更大范围的支持

不过，只有当合作能够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时，政府才会抵制“以我为主”政策的诱惑。而为了实现这点，人们必须相信国际合作能够减轻与全球化成本有关的合理而广泛的担忧。否则，选民更容易听信政治领导人“自给自足”的诱人论调。

这意味着，各国政府需要确保政策能够为那些受到贸易或技术进步不利影响的人们提供帮助。这也意味着需要实施相关政策以减轻不平等、通过人力投资扩大经济机会、提高政府透明度（特别是提高税收体系的透明度）以及控制腐败。

过去几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成员国提供各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中越来越关注这些问题。

建立对合作的支持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谦逊。战后风头正劲的日子已经过去，当时各国正式放弃其主权的某些部分，包括汇率主权。现在，更重要的合作方式将依赖于“软”法

律，即各国集体商定采用最佳做法（例如银行监管方面的巴塞尔核心原则），而不是“硬”法律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义务。

过去七十年里，福祉和机遇显著扩大，全球合作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全球合作必定会带来成果。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采用新的合作模式、完善沟通以及与公众产生广泛共鸣的全球政策议程。

简言之，世界需要一个全新的多边主义。



Vitor Gaspar，葡萄牙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主任。在加入基金组织之前，他曾在葡萄牙中央银行担任多个高级政策职务，包括最近担任的特别顾问。2011年至2013年，他任葡萄牙财政部长；2007年至2010年，任欧洲联盟委员会欧洲政策顾问局负责人；1998年至2004年，任欧洲央行研究总干事。**Gaspar**先生拥有里斯本新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做博士后。他曾就读于葡萄牙天主教大学。



Sean Haga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总顾问和法律部主任。他曾在纽约和东京私人执业。他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业务，包括其监管、政策建议和贷款职能的法律问题向基金组织管理层、执董会和成员国提供咨询。他就基金组织法律以及关于预防和解决金融危机的广泛法律问题发表大量文章，重点关注破产和债务重组。



Maurice Obstfel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目前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休假。他是伯克利分校1958届经济学教授，曾担任该校经济系主任（1998-2001年）。在1991年前往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之前，他曾正式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79-1986年）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86-1989年），并在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89-1990年）。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73年获学士学位）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75年获硕士学位），并于1979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2014年7月到2015年8月，Obstfeld博士担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在此之前曾担任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顾问（2002-2014年）。他还是计量经济学会和美国艺术和科学院成员。Obstfeld博士获得的荣誉包括蒂尔堡大学特亚林·科普曼斯资产奖、Rajk Laszlo 高等研究院（布达佩斯）约翰·冯·诺伊曼奖和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伯恩哈德·哈姆斯奖。他还发表了许多著名演说，包括美国经济协会的年度理查·伊利演讲、印度储备银行的L.K.Jha纪念演讲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格雷厄姆纪念演讲。他

还曾在美国经济协会执行委员会工作，并担任该协会副主席。此外，他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全球多家中央银行从事咨询和教学工作。

Obstfeld 博士是两本主要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联合作者——《国际经济学》（第 10 版，2014 年与 Paul Krugman 和 Marc Melitz 合著）和《国际宏观经济学基础》（1996 年与 Kenneth Rogoff 合著）。他还著有 100 多篇关于汇率、国际金融危机、全球资本市场和货币政策的研究文章。